

早期中国研究

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院 编

第4辑



早期中国研究

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院
编

第4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早期中国研究. 第4辑 / 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院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 3
ISBN 978-7-5325-9859-5

I. ①早… II. ①北… III. ①考古学—中国—文集
IV. ①K87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029301 号

早期中国研究(第4辑)

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院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浙江临安曙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5.25 插页 4 字数 235,000

2021 年 3 月第 1 版 202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9859-5

K·2951 定价: 8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早期中国研究》

编辑委员会

顾 问：严文明

主 任：陈悦新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冯小波 李若水 宋 蓉 陈悦新 张 经

张俊娜 张登毅 林怡娴 赵静芳 贾昌明

黄可佳

本辑主编：张 经

编者语

我们这里所谓“早期中国”，实即“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的简称，是指秦汉以前中国大部分地区文化彼此交融联系而形成的相对的文化共同体，也可称为“早期中国文化圈”。

早期中国以中原为核心，并且至少自五帝以来就基本前后相承、连续发展，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认识。但自晚清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中国弱势地位的显现，疑古思潮在国内外渐成风气，这一认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在顾颉刚等主编的《古史辨》中有集中体现。当然随着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王国维、徐旭生等对古史的研究整理，以及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殷墟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极端的疑古思潮已经淡出史学领域，商代晚期以来的中国史基本为信史、中华文明的起源在商代晚期以前等观点已成学术界共识，但商代晚期以前是否存在文化意义上连续发展的早期中国，或者这个早期中国有着怎样的文化格局、特质和发展过程，都还没有定论或者不很清楚。即便是商代晚期和周代，其作为“早期中国”的范围和格局也都还歧义纷呈。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热烈讨论中，主要由中国学者进行的绝大部分研究都直接论述中国古代文明或国家起源的时间、标志、过程等，到处冠以“中国”而恰恰对“中国”概念不加深究，对“中国”的范围不加界定，由此自然会引来一些敏感的西方同行的非议。只有少数学者注意到早期或古代的“中国”这个概念本身需要加以研究。这当中，严文明认为中国史前文化具有统一性与多样性特点，并且存在“重瓣花朵式的格局”；张光直提出在公元前 4000 年前已经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中国文明具有连续性和

整体性特征等,可以说已经初步搭建了早期中国文化格局的基本框架。但这些认识还远未能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还需要深入广泛的讨论。

围绕着早期中国,值得探索的重大问题还有很多:早期中国形成和发展的环境背景是什么,机制动因是什么?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对此后文化上中国的连续发展有何影响,又是从何种意义上影响到政治上中国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影响到世界文明体系中“中国模式”的形成?认识清楚文化上早期中国数千年的连续发展经验,对于看清中国未来发展方向,选择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于全球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启示作用?

解决这些问题自然当以考古学为基础,同时也需要多学科协作。正如严文明在《古代文明》(第1卷)的“发刊辞”中所说:“我们不但希望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通力合作,还希望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生物学、地质学和其他有关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学者积极参与。”这也同样是我们编辑《早期中国研究》的宗旨。希望这个辑刊能得到学界的支持和爱护,在早期中国研究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目 录

编者语	(i)
中国地区现代人起源研究的考古学进展	高 星 (1)
试论邓家湾的陶制“列祖”祭祀遗存	
——筒形器遗迹解析	武家壁 (12)
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豕牲	刘 源 (33)
中国古代的草原式兵器与一对一单兵作战的意义	杰西卡·罗森 (66)
社会学视角下的西周王年制度及其应用(者)	夏玉婷 (124)
从金文看宗妇在祭祀活动中的地位	张 经 (151)
汉帝国与希腊化世界的交往	
——再议海昏侯基金器中的花丝装饰	刘 艳 (161)
山形枝灯与钱树：考古所见汉代神仙观念的地域性表达	宋 蓉 (189)
玉石器管钻技术的动态模拟实验研究	黄可佳 王 雪 (208)
苏美尔文明与中原文明的比较探索	何 弩 (221)
后记	(233)

中国地区现代人起源 研究的考古学进展

高 星^①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一 引 言

自 1987 年三位西方遗传学家提出所有现代人的直接祖先都起源于非洲的“近期出自非洲说”(Recent out of Africa)后,^②现代人起源与演化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学术问题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学术界围绕此问题形成两大理论阵营,分别主张现代人类“非洲单一地区起源”^③和“多地区进化”,^④两者发生着激烈的论辩,并各自寻找证据强化论述。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和新成果的产生,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相关假说也得到发展或修正。人类化石发现与研究表明,在晚更新世并存几个不同的“形态人种”或“基因人种”,包括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弗洛里斯人、吕宋人、马鹿洞人和早期现代人等。这些人群(至少是其中的部分)之间存在形态的混合与镶嵌,早先被

① 本项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72024)、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B类,项目编号 XDB26000000)、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2014FY110300)的资助。

② Cann R. L., Stoneking M., Wilson A. C. . “Mitochondrial DNA and human evolution”. *Nature*, 1987, 325: 31 - 36.

③ Stringer, C., Andrews, P. . “Genetic and fossil evidence for the origin of modern humans”. *Science*, 1988, 239: 1263 - 1268.

④ Wolpoff, M. H., J. Hawks, and R. Caspari. “Multiregional, not multiple origins”.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2000, 112(1): 129 - 136.

提出的“同化说”^①得到重视;近年来对早期现代人、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之间的遗传关系研究获得突破,提取到三者混血的DNA证据,由此引发对“人种”、“人群”概念及其关系的反思。一些主张“现代人类出自非洲说”的学者也逐渐从“完全替代论”向“同化说”调整。考古学研究表明,早先部分学者所提出的早期现代人行为标志的清单(包括精美的石叶工具,磨制骨器,装饰品,原始艺术创作,刻划符号,墓葬,远距离材料获取或交换,复杂的空间使用方式,狩猎大型动物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区分特定的人群,原以为现代人独有的“现代人行为”或“行为现代性”出现在不同的时间与地区,与化石证据和遗传证据并非一致,“行为现代性”与现代人并无一一对应的关系。

在此背景下,中国地区有关现代人起源、演化材料的发现与研究也取得重要进展,对该重大学术问题研究的贡献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②对陕西“大荔人”、贵州盘县“大洞人”、广西崇左智人、河南灵井许昌人等古人类化石的研究表明,早期现代人的一些体质特征已经在本地区距今30万-10万年间的一些古老型人类化石上有清晰的表现,这些化石人类显示出向“现代”方向连续演化和形态镶嵌的特点;在湖北黄龙洞、湖南福岩洞等遗址新发现的人类化石表明,具有毋庸置疑的现代人特征的化石人类于约距今10万年前后即在中国南部和中部出现。^③遗传学研究从“田园洞人”化石上提取到线粒体DNA与核DNA,证明东亚现代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直接祖先于4万年前即生活在北京周口店地区,并且在遗传上已经与同期的欧亚古人群有所分异;^④考古学证据则表明,中国乃至东亚本土的石器技术及其反映的人群生存方式一脉相承,没有发生过中断或替代,距今10万-5万年间没有发生过本土古人群的大灭绝。这些新发现与新成果,尤其是学科交叉研究所取得的进展,使该地区现代人起源与演化的脉络变得清晰起来,过

① Smith, F., Falsetti, A., Donnelly, S.. "Modern human origins". *Yearbook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1989, 32: 35-68.

② 高星、彭菲、付巧妹、李锋:《中国地区现代人起源问题研究进展》,《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8年第48卷第1期,第30-41页。

③ 刘武、邢松、吴秀杰:《中更新世晚期以来中国古人类化石形态特征的多样性》,《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16年第46卷第7期,第906-917页。

④ Qiaomei Fu, Matthias Meyer, Xing Gao. "Udo Stenzel, Hernán A. Burbano, Janet Kelso, and Svante Pääbo. DNA analysis of an early modern human from Tianyuan Cave, China". *PNAS*, 2013, 110 (6): 2223-2227.

程与细节正在不断被揭示,吴新智先生所提出的中国乃至东亚地区人类演化的“连续进化附带杂交”^①假说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

二 从考古学角度对本土人类连续演化的研究和论述

在对现代人起源问题讨论的初期,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很少参与其中。随着分子生物学家提出中国地区距今 10 万-5 万年间缺乏人类生存的证据,以此推断该地区人类演化曾发生过中断,古人类学者寻求旧石器时代文化材料对其进行反驳,考古学家开始投身到对这一学术问题的探讨中。考古学材料对该地区现代人起源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文化序列支持“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假说;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丰富了人类行为现代性的内涵,揭示了其多样性。

人类自更新世早期就出现在中国及东亚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越来越丰富,并显示出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的特点,^②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 石器原料特点及开发利用方式:在旧石器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内,这里的古人类广泛采用脉石英、石英岩、砂岩、火山角砾岩等劣质原料制作工具,开发方式为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对多种材料皆加以开发利用。

2. 石器制作技术:在剥片技术上的总体特点是随意性和机动性,表现为应用锤击法、砸击法、碰砧法、摔碰法、压制法等多种方法,并能根据石料特点采用适合的方法,例如北京猿人用砸击法开发脉石英材料,三峡地区的先民用摔碰法应对高度磨圆的卵石。在加工技术上表现出简单、随意、对坯材改造程度浅的特点,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两面器技术、勒瓦娄哇技术、石叶技术等只在局部区域和特定时段才短时出现。

3. 石制品类型、形态与组合特点:中国乃至东亚的旧石器时代石器组合经

^① 吴新智:《从中国晚期智人颅牙特征看中国现代人起源》,《人类学学报》1998年第17期,第276-282页。

^② 高星:《更新世东亚人群连续演化的考古证据及其相关问题论述》,《人类学学报》2014年第33期,第237-253页。

常被西学者描述为“砍砸器传统”或“简单的石核-石片工业”,工具类型主要是用砾石或石片加工的刮削器、砍砸器,辅之以尖状器、手镐、石锥、石球等;像手斧、薄刃斧这样在非洲和欧亚大陆西部旧石器时代早期居于主体地位的器类在东方的大多数遗址中缺失;一些器类分化不明显,同一类型内个体变异大,规范性较差。这样的局面只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北方的一些遗址方得以改变。

4. 区域文化传统的传承:张森水先生提出旧石器时代的中国南、北方长期存在有明显区别的技术体系,即南方的“砾石石器主工业”和北方的“小石片石器主工业”,而在各自的区域内存在着地方性文化变体。^① 这样的划分当然不是绝对的,例如北方的一些遗址也出土大型砾石工具,南方的云贵高原则流行石片石器,但这些区域存在继承性强并稳定持久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体系是明确的。

5. 不存在距今 10 万-5 万年的空白时段:“出自非洲说”对东亚人类演化的一个重要假设是这里存在距今 10 万-5 万年间的化石证据空白,说明本土人群在那一期间演化中断,原因是末次冰期的恶劣气候导致原住民灭绝,直至从非洲起源、经过长距离迁徙的“现代人”到达这里。从考古遗存的角度看,这一假设完全不成立。河北与山西交界处的许家窑-侯家窑遗址,洛阳北窑遗址,甘肃杨上遗址和大地湾遗址,河南织机洞遗址,陕西洛南盆地、汉中盆地和蓝田地区的多处遗址,重庆的井水湾、枣子坪、池坝岭、冉家路口等遗址,湖北的黄龙洞遗址等,都存在距今 10 万-5 万年间的文化层位和人类遗存。古环境分析也不支持末次冰期导致本土人群灭绝的假设。

对郑州地区织机洞、老奶奶庙、赵庄、黄帝口等多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表明,这里的石器技术仍然保留华北小石片石器的传统,但出现复杂的空间利用、远距离开采原料等被认为具有现代人特点的行为方式或行为现代性特点;赵庄遗址出现大象的头骨被放置在用褐红色石英砂岩块堆砌的基座上这样具有祭祀特点的遗迹,更是现代人行为的表征,这说明本土人群经过演化进入了现代人的序列。^②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宁夏水洞沟遗址,

^① 张森水:《管窥新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重大发展》,《人类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193-214页。

^② 王幼平、汪松枝:《MIS3阶段嵩山东麓旧石器发现与问题》,《人类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304-314页。

这里在距今4万-3万年间出现具有西方文化特点的勒瓦娄哇-石叶技术,但在3万年以后回归华北长期流行的小石片技术体系,出现简单的石核、石片和用石片加工的刮削器、尖状器组合,同时出现磨制骨器、装饰品、对居址复杂利用、对石料热处理和采食、加工植物性食材等被认为是现代人行为标志的文化遗存与现象,当地的原住民也已演化为现代人。^① 在这里,虽然可能发生过外来人群的迁入,但并未发生对本土人群及其文化的替代,相反,本土人群连续演化并向“现代”方向发展是主旋律。

三 考古学资料对早期现代人群“北方迁徙路线”的辨识与解读

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表明,本土人群连续演化并非是对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的完整、准确表述;外部人群的迁入并与本土人群的融合也对现代人群的形成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早前部分分子生物学家提出源自非洲的早期现代人群是沿着“南方路线”先到达东南亚、华南,然后北上扩散。人类化石的发现似乎也在证实这种假设,从湖南福岩洞和湖北黄龙洞发现的具有现代人特点的牙齿的年代数据要早于在北方发现的田园洞人和山顶洞人。但这样的假设尚未得到考古证据的支持,在华南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一直固守传统模式。贵州马鞍山遗址出现3万年前的磨制骨器是一个显著的例外,^②其他遗址都没有出现石叶、骨器、装饰品、远距离搬运石料等具有早期现代人行为标识的文化现象。对此存在如下的可能性:1. 外来人群的文化证据尚未被发现;2. 小股的外来人群很快被本土人群同化,原本的行为与文化特点消弭;3. 不存在经“南方路线”进入华南的外来早期现代人群;4. 早期现代人出现在华南并不早于北方,报道的福岩洞等遗址出土的早期现代人的年代测定存在错误。

与华南外来的早期现代人在文化上处于“隐身”状态相比,中国北方的外

^① 李锋、陈福友、高星:《水洞沟遗址第2地点古人类“行为现代性”及演化意义》,《人类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510-521页。

^② Shuangquan Zhang, Francesco d'Errico, Lucinda R. Backwell, Yue Zhang, Fuyou Chen, Xing Gao. "Ma'anshan cave and the origin of bone tool technology in China".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16, 65: 57-69.

来人群的文化踪影则是清晰、明确的。对内蒙古金斯太遗址下部第7-8层的年代、动物化石和石制品等进行研究表明,该遗址的石制品组合具有明确的莫斯特技术特征,这一发现将莫斯特技术遗存在欧亚大陆的分布从西伯利亚往东推进了近2000公里。^①¹⁴C测年显示该遗址第8层形成于距今4.7万-4.2万年,第7层形成于距今4万-3.7万年。两层出土的石制品大同小异,皆存在典型的勒瓦娄哇产品、盘状石核,以及旧石器时代中期典型的刮削器,包括陡刃加工的横刃刮削器和斜轴刮削器等。该组合与中国相近时段的文化遗存明显不同,更接近欧洲、西亚、中亚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莫斯特技术体系,尤其与俄罗斯西伯利亚 Okladnikov、Chagyrskaya 洞穴发现的莫斯特遗存类似。这种与西方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高度相似而在本土却找不到源头的文化遗存,被推断是末次冰期期间部分人群东移、南下的遗留更加合理。

宁夏水洞沟遗址群也提供了相似的案例。^②水洞沟遗址群共包含12个旧石器时代地点,其中第1、2、8、9、12等地点经过系统的发掘和科学的测年,显示距今4万年左右古人类开始进入水洞沟地区,此时先民拥有具有勒瓦娄哇遗风的石叶技术,此种技术具有明显的“西方”特色,与欧亚大陆西部、北部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的石器技术具有高度相似性,指示了该时段古人类自西向东的北方扩散路线。但这种“外来”的技术及所代表的人群在水洞沟地区并未一直延续,距今约3.3万年,中国北方常见的简单石核石片技术在水洞沟地区流行,并持续到约2.7万年前。这一阶段该地区的古人类虽主要使用相对简单的石器技术,但开始制作和使用装饰品(鸵鸟蛋皮串珠、穿孔贝壳等),远距离采集优质石料,制作和使用磨制骨器,采取复杂的用火方式(密集的火塘和对石料的热处理)。这些表明外来人群没有替代本土人群,很可能发生了融合与文化交流;本土人群在简单石核石片体系内产生了一系列技术和认知革新,进入现代人群的序列。

^① Feng Li, Steven L. Kuhn, Fuyou Chen, Yinghua Wang, John Southon, Fei Peng, Mingchao Shan, Chunxue Wang, Junyi Ge, Xiaomin Wang, Tala Yun, Xing Gao. "The easternmost Middle Paleolithic (Mousterian) from Jinsitai Cave, North China".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2018, 114: 76-84.

^② 高星、王惠民、裴树文、陈福友:《水洞沟——2003-2007年度考古发掘与研究报告》,科学出版社,2013年。

四 对早期现代人适应能力与生存方式的考古学发现与研究

现代人处于人类演化的最新阶段。此时的人类在体质上、技术上、认知能力上和社会协作上都比以前的人类更进步,具有更强的适应生存能力,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于是才能在与同时生存的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古老型人群的竞争中胜出,成就我们今天的人类与文明。来自西藏那曲尼阿底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我们研究早期现代人迁徙扩散的过程、能力和适应、征服极端环境的方式揭开了冰山的一角。

人类先行者最早何时扩散到青藏高原,尤其是高海拔的高原腹地这样的极端环境,一直为学界和大众所关注。作为“地球第三极”,广袤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 000米以上,高寒缺氧,资源稀缺,环境恶劣,对人类生存构成严峻的挑战。近年来考古学、分子生物学、古环境学等不同学科对早期人群进驻、适应高原的时间与过程以及藏族人群的来源做出推导并提出多种假说,但均有待证实。

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和地质工作者在西藏地区开展了断续的考察,发现昌都卡若、定日苏热等遗址,证明史前便有人群在青藏高原生存和繁衍。70年来,各科考队在西藏近100个地点发现了石制品,但由于这些石器文化遗物皆发现于地表,找不到原生地层,无法确定它们的时代,先民生存的确切时间便无从知晓。

2011年始,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的一个旧石器时代考古团队10次登上高原,寻觅先民迁徙、生存的足迹。2013年,考察队在那曲地区申扎县雄梅乡的色林错湖岸发现一处海拔4 600米、规模宏大的露天遗址——尼阿底,在地表发现大量裸露的石制品,人工特点明确,并在原生地层中试掘出文化遗物。2016-2018年,考古队对该遗址做了系统的发掘、测年和埋藏学、古环境学研究,在约4万-3万年前的地层中发掘出4 000余件石制品。^①

^① X. L. Zhang, B. B. Ha, S. J. Wang, Z. J. Chen, J. Y. Ge, H. Long, W. He, W. Da, X. M. Nian, M. J. Yi, X. Y. Zhou, P. Q. Zhang, Y. S. Jin, O. Bar-Yosef, J. W. Olsen, X. Gao. "The earliest human occupation of the high-altitude Tibetan Plateau 40 thousand to 30 thousand years ago". *Science*, 2018, 362: 1049-1051.

这些石制品技术特点明确,属于石叶技术体系,多是从棱柱状石核上从一个方向或对向剥离下来的。石叶技术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的一种独特的工具制作技术,具有预制石核-定向剥片-系统加工等固定的操作链流程,其产品规范、精致、锋利,多被加工成锐利的矛形器并安装木柄使用,成为先民狩猎的利器;该技术体系代表人类石器技术和认知能力的一座高峰,为征服高原等极端环境提供了有力的技术装备。该技术体系被认为是早期现代人的文化标识,主要流行于非洲、欧洲、西亚和西伯利亚等地区,在中国北方的少量遗址亦有所发现。从大量石核、石片、断块、碎屑的存在以及附近有优质的硅质板岩露头等现象,以及未发现动物骨骼、用火遗迹等生活遗存判断,这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季节性前来采集原料、制作工具的石器制造场。

通过对出土石叶遗存的遗址的比较研究,尼阿底遗址与我国宁夏的水洞沟遗址,新疆的骆驼石和沟西遗址等具有密切的文化联系,在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有与此十分相似的石器技术体系,表明在末次冰期中亚、东亚人群发生过大规模的迁徙和交流,青藏高原很可能是一些在寒冷地区生活的古人群迁徙扩散并南下的通道,丹尼索瓦人(丹人)很可能是其中的一支。DNA 研究发现,藏族人群与丹人共享少量基因片段,这被认为对研究藏族人群的来源及其适应高寒环境能力的获得提供了线索。丹人原本发现在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的丹尼索瓦洞穴距今 3 万多年的地层中,最近对早先发现于我国甘肃省甘南地区白石崖洞穴的一个残破的古人类下颌骨的蛋白结构和测年分析表明,丹人可能至少于 16 万年前就生存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区,^①很可能是在中国早已发现的早期智人的一个分支。这项发现表明,藏族人群适应高海拔环境可能经历了一个长期生存、演化的过程,而尼阿底遗址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一处驿站;在此前、后续错综复杂、精彩纷呈的人群扩散、融合和对高原环境的征服过程,以及定居在雪域高原上的藏族人群的构成和生存繁衍的故事,尚需更多考古发现与研究去揭示、去书写。

尼阿底遗址及其文化遗存表明,先民在距今 4 万-3 万年前已踏足青藏

^① Fahu Chen, Frido Welker, Chuan-Chou Shen, Shara E. Bailey, Inga Bergmann, Simon Davis, Huan Xia, Hui Wang, Roman Fischer, Sarah E. Freidline, Tsai-Luen Yu, Matthew M. Skinner, Stefanie Stelzer, Guangrong Dong, Qiaomei Fu, Guanghui Dong, Jian Wang, Dongju Zhang & Jean-Jacques Hublin. "A late Middle Pleistocene Denisovan mandible from the Tibetan Plateau". *Nature*, 2019, <https://doi.org/10.1038/s41586-019-1139-x>.

高原的高海拔地区,在世界屋脊上留下了清晰、坚实的足迹。该遗址海拔 4 600 米,是目前世界上史前人类在高海拔地区生活的最高纪录。晚更新世是现代人类演化的关键时期,人类的技术和认知能力快速发展,适应环境能力增强,扩散到世界大多区域,但环境极端恶劣的高原依然人迹罕至。从全球范围看,此前人类活动的最高遗迹发现于安第斯高原的 Cuncaicha 岩厦遗址,海拔 4 480 米,年代为 1.2 万年前。尼阿底遗址的发现书写了人类挑战与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新纪录,对于研究早期现代人群扩散的能力、范围和适应极端环境的生理能力与智力水平,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和信息。

五 结语与讨论

综合分析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特点及其演变过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乃至东亚旧石器文化及其反映的古人群生存演化是一脉相承、连续不断的,虽然有手斧、勒瓦娄哇技术、石叶等“西方元素”间或出现在不同地区,但都逐渐消失或被融入本地土著文化中,这为东亚古人群“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假说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证据;大量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年代学领域的新进展确认中国与东亚在距今 10 万-5 万年间不断有人群在生活和迁徙,不存在人类演化的空白;古环境分析也不支持末次冰期导致本土人群大灭绝的假设;而对东亚地区古人类演化的“综合行为模式”^①提炼和对人类独特的行为特点与社会属性的观察和思考,也对本土人群与西方同类的隔离问题及不同地区人群长时期维持在同一物种内的可能性与动因提供了有益的启示。^②

从目前的各方面证据来看,现代人群演化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演化模式,不同的古老型人群或多或少对今日的人类基因库做出过遗传贡献。从非洲扩散出来的早期现代人是欧洲、西亚人直接祖先的优势人群,但当地的尼安德特人也做出了一定的基因贡献。而在东亚地区,

^① 高星、裴树文:《中国古人类石器技术与生存模式的考古学阐释》,《第四纪研究》2006 年第 4 期,第 504-513 页。

^② 吴新智:《从中国晚期智人颅牙特征看中国现代人起源》,《人类学学报》1998 年第 17 期,第 276-282 页。

包括丹人在内的本土早期智人在不断演化,最终与扩散至此的尼安德特人和来自非洲的早期现代人相融合,共同演化成现代东亚人。

在讨论现代人起源与演化的语境中,学术界和媒体经常会提及不同的“人种”,例如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早期现代人、弗洛里斯人、吕宋人、马鹿洞人等。这些所谓的“人种”有时会被业外人士认作不同的物种。这是误解,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之间存在生殖隔离,他们是在人类演化的特定时段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具有一定体质形态或遗传特点的区域性人群,有些人群同时存在并在迁徙互动中发生基因交流,就如当代在不同地区生活着不同的肤色人种、他们之间可以生儿育女一样,迁徙与融合,一直是人类演化的重要旋律。

在对现代人起源与演化的研究中,不同学科领域各有优势和短板。^①开展相关领域的交流合作,尤其是传统的古人类学、考古学与新兴的分子生物学之间的交叉与协作,明确彼此的关注点、需求和专长,凝练共同的学术问题和目标,整合现有的资源与成果并向着共同的学术方向一道前行,应是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并破译现代人起源这一重大命题的关键所在。

Archaeological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Modern Humans in China

Gao Xing

Two alternative hypotheses concerning modern human origins and evolution in China and East Asia have competed for several decades: the “Recent Out-of-Africa” model and the “Continuity with Hybridization” hypothesis. Discoveries of new human fossil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dvances in research methods, as well as the involvement of more research fields in the quest have deepened our

^① 高星:《朝向人类起源与演化研究的共业:古人类学、考古学与遗传学的交叉与整合》,《人类学学报》2017年第1期,第131-140页。